國際視野叢書①

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

敵乎？友乎？

——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

Gordon H. Chang 著
梅寅生譯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FRIENDS AND ENEMIES

金禾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511
F722
276

國際視野叢書 1

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

敵乎？友乎？
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

Gordon H. Chang著
梅　寅　生譯

金禾出版社

WSB
1/93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
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
美・Gordon H. Chang 著；梅寅生譯。
台北市　金禾出版社　民81年1月初版
320面　　公分
譯自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ISBN　957-8573-01-4　(平裝)240元
Ⅰ. 二次大戰後的國際政治
Ⅱ. 歷史

Copyright © 1990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riends and Enemies *by* Chang, Gordon 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
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
原著□ Chang, Gordon H.　　譯者□梅寅生

發 行 人　郭俊銖　　定價240元
執行編輯　郭譽孚
印　　行　金禾出版社有限公司　　郵撥：15550108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3巷 2 號 5 樓
TEL：(02)721～0137—9　FAX：(02)7520319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074號
電腦排版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所　優文印刷廠
總 經 銷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5F 之6
TEL：(02)366-0309　FAX：(02)366-0310
□版權所有
ISBN　957-8573-01-4

外交政策的第一要件是能辨別你的朋友和敵人。

——艾奇遜，1971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問題。

——毛澤東，1927

譯序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美國當局便以執行中蘇歧見之惡化及其後分裂之利用爲主要目標。他們爲分化中蘇的想法有時出乎意料之外，也並非始終如一。而揆其原因則爲麥卡錫的整肅使國務院中的中國問題專家如謝偉志（John S. Serrice）、戴維思（John Paton Davis, Jr.）、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克拉布（Oliver Edmunh Clubb）等或罷黜或流放，以致政策制訂人中缺乏對中共領導人應有之了解。

國務院政策制訂者的想法影響了美國在韓戰和金馬危機中的行動，也影響了美國對中共核武發展的反應以及美國介入越戰的決定。

作者運用了新發掘和最近公開的文件，敍述了近卅年來中美蘇關係嬗變的過程。作者持論不苟，每於本事之外寄抑揚。

茲以付梓在即，略述本書要旨如上。譯者對金禾出版社發行人郭俊銖先生、執行編輯郭譽孚先生對譯稿嚴謹之校讀，深表敬佩，並感謝郭俊銖先生將書名由《朋友與敵人》改爲《敵乎？友乎？》之建議。

譯者謹識於新竹

一九九二年元月五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此書獻給

志豪、愛華、竹君、璽庭、和嘉瑩，因爲您們帶給我無限的溫馨和安慰，使我的晚年在您們的歡笑中渡過。

目錄

譯序

自序 1

引言 5

第一章 老朋友和新敵人 9

第二章 聯盟的削弱，聯盟的鑄造 45

第三章 分化的策略 81

第四章 到了原子戰爭的邊緣 115

第五章 中國是主要敵人嗎？ 139

第六章 走向美蘇利害關係共同體 169

第七章 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及帝國主義者 195

第八章 甘迺迪，中國大陸和原子彈 219

第九章 兜了一個大圈子？ 243

餘 論 273

註 釋 283

自序

我在這裡對協助我完成此書的諸位，深致謝意。伯恩斯坦（Bart Berstein）和肯乃第（David Kennedy）在整個規劃中給予我的鼓勵和支持。達林（Alex Dallin）、劉易士（John Lewis）、洛文（Rebecca Lowen）和索爾蒙（Michael Salmon）在不同的階段中他們花費了不少寶貴的時間閱讀原稿。伊森頓（Phil Ethington）也讀了最初的幾章。由於朋友和同事的評論和批評，本書得以改進。但書中倘有不夠精確和失當之處，仍由本人負責。

國家檔案局和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詹森總統圖書館能幹而熱情的檔案保管員及全體工作人員，對我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指引。普林斯敦大學慕德圖書館、耶魯大學斯特靈圖書館、洛克菲勒大學的洛克菲勒檔案中心、柏克萊加州大學班克洛夫圖書館、胡佛研究所的圖書館和檔案庫以及史丹福大學的格林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對我的研究都有重大的貢獻。我的朋友和在史丹

福大學國際戰略學會工作的同事，也幫忙不少。我也要感謝在中國大陸和我一起工作的夥伴，他們幫我安排研究訪問，並介紹對中國外交政策曾提供見識的專家和政府官員。我特別感謝的是王迪亞（譯音）、袁明（譯音）、何迪、張啓芳（譯音）、資中筠、張曉明（譯音）諸位。我也要感謝新中國新聞社，該社允許我在他們的幾所照片的檔案保管處中渡過一個迷人的上午，並且提供給本書許多的插圖（由於製版不便，本譯文之出版，於此，只有割愛。）史丹福大學出版社的拜耳（Muriel Bell）和諾肯（Barbara Mnookin）在原稿的整個準備中，提供了明智的意見。

另外也有幾個組織，由於它們的支持使我的研究成爲可能。由史丹福麥克阿瑟基金會所屬的國際安全及武器管制中心支配的一項研究員基金和研究專款使我能以合適的方式完成我的研究和著述。史丹福的國際研究中心支援我一次中國大陸之行。我也要感謝史丹福研究生辦公室和歷史系、杜魯門學會和詹森基金會，因爲他們提供我研究獎助金。許多親朋的熱情鼓勵和諒解，在我研究和著述的過程中始終支持我。對他們我由衷地致謝。我也要感謝卡門（Carmen）對我的耐心和體貼。

我寫此書依靠大量以前列入機密而最近幾年美國政府已經發表的有關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和詹森任期內美國外交政策之執行的資料。在即將到來的歲月中，更多的資料還要發表，這將使我們能深一層地洞察美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1960年代的。但是在接近“等邊的”三角關係的歷史研究之類的東西能夠完成之前，甚至在蘇聯和中國大陸現在出現的劇烈政治變化，那也將是一段很長的時期。莫斯科和北京制訂政策的檔案都不太可能很快開放。因爲我們對中國大陸和蘇聯的政策制訂只限於能自己公佈的資料和回憶錄中所蒐集者，所以此項研究必須借重美國方面的

了解，並且特別著重於官方和傑出人物的意見。

第四章較早的改寫本曾刊載1988年春季那一期的《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八章較早的改寫本曾在接受1987年帕爾塞紀念獎 (Lewis Pelzer Memorial Award) 之後，刊載1988年三月號《美國歷史學報》(Journal of Ameican History)。以上兩文撰寫時尚未見到的資料，在本書正文及註釋中均已增補。

中國的人名、地名及出處，除少數例外，均用拼音。書中仍用Chiang Kai-shek, Hong Kong, Kuomintang, Sun Yat-sen, Taipei, Yangtze River, and Yenching是因爲美國讀者對他們的熟悉。多年來中國人在英文的出版物中將毛的名字以不同的方式譯出。我在註中使之統一爲Mao Tsetung。

G. H. C.
(張少書)

縮寫說明

ACDA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CF	Country Files of NSF
CF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SB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FO	Foreign Office, UK
FR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CS	Joint Chiefs of Satff
NA	National Archives
NSC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F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NYT	New York Times
OSANSA	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OCA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SD
OSD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POF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PPS	Policy Planning Staff, SD
PRO	Public Record Office. UK
PSF	Presidental Security Files of NSF
Quantico Report	"Report of the Quantico Vulnerabilities Panel," June 10, 1955, Eisenhower Papers, WHCF, Confidential File, Subjects, box 63, Russia 6
RG	Record Group, NA
SD	State Department
SSP	Special Studies Project, Rockefeller Archives Center, Rockefeller University
VPSF	Vice-Presidential Security Files
WHCF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WHSF	White House Security File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言

對我們那些曾經度過五十年代的人來講，最鮮明的共同記憶必定是一幅世界地圖——凌駕其上的是廣大、連綿不斷象徵共產主義的俄國和中國大陸土地的一大片紅色。在我們的眼前，這個革命的顏色似乎即將淹沒世界上其他以淡藍、綠、粉紅和黃色描繪的國家——反映冷戰的地緣政治論的現實。

這幅地圖渲染了美國大眾對當時被認爲是存在的“國際共產主義”、“中蘇集團”或“團結堅如磐石的共產主義”之信念。在五十年代，關於國際事務如果似乎是一項無可辯駁的假定，那就是美國所面臨的不只是一個團結一致的而且是一無隙縫的共產主義威脅。共產主義沒有國家的身份差別。

那種地圖使我們心理對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年代中一件大事——中蘇聯盟的破裂——作了不適當的準備。至少早在1960年的開始，中蘇就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不久即沿著他們在西伯利

亞和中亞細亞荒野中的共同邊界血戰。他們的分裂改變了整個國際政治的面貌：國際權力的兩極分裂由“權力擴散”（“diffusion of power”）（引羅斯陶語（Walt W. Rostow），氏曾任甘迺迪時代助理國務卿是一位經濟史權威和國際問題專家，進入白宮後，相繼在甘迺迪及詹森政府中擔任要職。著有“美國之外交革命”、“經濟發展史觀”、“蘇聯社會動力之研究”等，後兩書台灣曾有譯本。）取而代之，後者需要更老練而複雜的外交。季辛吉與尼克森，周恩來與毛澤東要起來應付這項挑戰。他們要把他們的國家從現代國際歷史中最不友善和僵硬的關係中解救出來。

一個團結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死亡也在第三世界和資本主義國家中深刻地轉變了對資本主義制度革命性的挑戰。當“現存社會主義”中兩個最突出實例之間的衝突顯得比他們與美國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更爲嚴重時，社會主義革命應作何解釋？中蘇分裂甚至對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都有其深遠的影響。沒有多中心的共產主義，就不可能發生整個社會主義世界中現在呈現的政治和經濟的根本改革。如果沒有中蘇分裂，很難想像今日的世界會像什麼樣子。

在社會主義的世界中像那樣的完全轉變是怎樣發生的呢？各共產主義者間的關係已經起了什麼變化？在地圖上的紅色污痕中是否有了不同的色彩？這個問題引起了西方學者的興趣，於是他們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中提出了廣泛而詳盡的文獻。他們仔細分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爭論，推究共產主義領導人物的心理和他們官僚政治的惡習，並且重新評估自帝國時代以來中俄關係的歷史。

可是對曾經研究過中共運動史的迂迴曲折及中蘇分裂的歷史學者而言，敍述如非錯誤，便有欠缺。大多數研究共產主義事務的專家及研究美國外交政策的歷史學家曾斷言美國在察覺產生中

蘇分裂的緊張局勢上行動緩慢，並且在分化共產黨徒方面著力不多。此說的證據是華盛頓過去明顯地把中共看作只不過克里姆林宮的附屬品。根據杜勒斯，艾森豪的國務卿，自己的老朋友（歷史學家）所說，杜勒斯確信毛澤東是“唯克里姆林宮之命是從”。① 當其時美國領導人物——幾位總統和國務卿都一樣——的公開評論幾乎完全沒有透露試圖在所假想的敵人陣營內製造分裂的興趣。但是我們難以相信美國最高級的政策制訂者以往是那麼愚鈍，那麼無知，對中蘇分裂的可能性那麼沒有感覺，對像國際共產主義的瓦解那樣的重大發展竟能就此置身事外嗎？

本書即從檢查上述問題開始。我所了解的遠超過我以往所懷疑的：自從1949年共軍在中國大陸獲勝以來，美國最高級政策制訂者是否曾假定共產主義堅如盤石，中國大陸不可挽救地“陷於”蘇聯，或美國是否無法鼓勵中蘇磨擦——即使不是最後的分裂。無法接觸到中共和蘇聯的檔案，不可能確定美國對中蘇分裂所負責的程度，但是至少可以說，自從1940年後期，美國的領導人物始終執行的政策，其深思熟慮的目的即爲使中蘇不和繼續深化。此外，每當中蘇不和出現時，美國即試圖利用。在1972年尼克森中國之行以前，美國在這方面的所有作爲均戲劇化地表現出世人所稱的三角政治——中美蘇對戰略利益相互影響的追求。

美國的政策制訂者自1940年代後期至1970年代初期關於美國如何可以分化其共產主義的對手，然後從其分裂中取利的想法，從來未曾一致而和諧。事實上，分化策略設計本身就使美國領導人物和美國及其最親密的盟邦和朋友對立。分化對手的想法倒不是未經過考驗——這些想法影響了1954——55及1958年美國在金馬危機中的行動，影響了美國對中國大陸核子武器發展的反應，也影響了美國介入韓戰和越戰的決定。再者，最諷刺的是，一項

看來顯而易見地對美國有利，並且或許是戰後時期華盛頓巨大勝利之一的政策最後却要很大的代價才付諸實行。

本書試圖說明中蘇聯盟是如何在美國政策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自1948至1972年尼克森歷史性的北京之行這段時期的對華政策——居於顯著的地位。本書尋求了解美國如何試圖暗地裡破壞中蘇聯盟，然後當破裂出現時，又如何試圖予以利用。②

當戈巴契夫在蘇聯掌權以前，雷根經常把蘇聯譴責爲“邪惡的帝國”，並將蘇聯的政策認作俄國的“帝國主義”。雷根的激烈言詞使人回想到1950年代冷戰的語言誇張。但是他的反共激烈演說僅表面上相似早期的浮誇語言，因爲他的反共作風並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的。雷根指責蘇聯和他認爲是蘇聯的代理者——尼加拉瓜的革命運動成員，薩爾瓦多的叛徒和古巴人。不過中共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心浮氣躁的開始之後，雷根專心致力於和北京不錯的關係，並繼續其前任民主黨的努力，試圖建立一個聯盟以對抗莫斯科。但是現在看來，就像早年華盛頓過份渲染的官方對於“國際共產主義”之反對，搞混了對世界事務更細緻的了解，或許雷根簡單的反蘇浮誇語言也不足以反映他外交政策之複雜性。經由了解美國在最近過去的幾年中如何試圖分化其最重要的敵人或可提供一些僅探討美、蘇雙方冷戰所不太可能提供的歷史展望。共產黨世界——尤其是中國大陸——現在處於混亂及轉變的狀態，這種了解也幫助我們得到對於現在美國政策目標的新見識。

第 1 章

老朋友和新敵人

你我過去是老朋友；你現在是我的敵人，我也是你的敵人。

富蘭克林（B. Franklin），1775年

當1945年八月八日蘇聯正式參加太平洋戰爭時，俄國人便以盟友的身份加入中（包括中共）美對日戰爭。大家在表面上都是對抗一個共同敵人的朋友。可是僅僅在四年之後，杜魯門政府發佈了美國有名的美中關係白皮書，把國民政府刻劃成腐敗而不值得美國進一步軍援，把蘇聯刻劃成使中國屈服的擴張主義強權，而把中共刻劃成克里姆林宮卑鄙的代理人。眾議員周以德（Walter H. Judd）——共和黨內主要的蔣介石支持者——悲歎美國對中日態度之轉變——美國在亞洲利益有了新的樞紐。周以德在他寫給自己的札記中寫道："過去是美國的敵人，而不是美國的朋友，該有多好。"①

實際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深深地改變了國際政治。美國——在實質上未受到損害，反而在經濟上受到鼓舞——戰後以勝利的超級強國出現。

廣大的英、法、荷由於他們的屬國紛紛試圖在國際事務中成爲自由的行動者，大帝國就變成歷史。蘇聯却因其極大的軍事和政治力量，赫然聳現成爲與美國爭取環球霸權的唯一挑戰者。

在1940年代晚期，對華府政策制訂者而言，要從新決定那些國家是朋友，那些國家是敵人殊非易事。美國在當時不但必須把以前的軸心大國（德、意、日）——儘管需要改造——看作重要的朋友；也必須和那些在東西方對抗中拒不作左右袒，而且與有些區域動蕩不安，其態度尚未確定的國家打交道。革命中的中國大陸屬於後一類。

就中國而言，美國曾經有過一個極重大的計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總統曾預想一個統一、安定而友善的中國作爲美國戰後在遠東利益的依靠。億萬的美元用來支援中國抗日，羅斯福並且把蔣介石提升到世界領袖的地位，使蔣有資格以“四強”（英、美、蘇、中）之一的身份參加1943年的開羅會議，幫助他們決定亞洲和平時期的未來。

但是當戰爭近尾聲時，中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衰弱使中國在戰後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不斷下降。相反地，中國已有成爲強國抗衡的戰場之危險。羅斯福爲著防止上述危險，在1945年初，同意史達林在雅爾達會議上所提的建議，答應蘇聯參戰並和國民政府簽訂一項中蘇友好條約換取東北亞的領土和特權。

然而，雅爾達協定並未能阻止美蘇之間的猜疑增長，隨戰爭快要結束猜疑反而升高。杜魯門在1945年4月於羅斯福逝世繼任總統之後，美國官員深信蘇聯鞏固其東歐影響力是它更廣泛的擴張主義的前兆——亞洲將也在其目標之內。雅爾達協定在解決國共兩黨對政權之爭奪所作的也微不足道。就在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之後不久，國共便認眞地恢復了他們已發動了幾乎廿年之久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